

Z

A 1050

2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满 族 朝 鲜 族 赫 哲 族

(征求意见稿)



K28
9
2:2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illegible]

满族 朝鲜族 赫哲族



A 847629

目 录

满 族..... (1)

朝鲜族..... (17)

赫哲族..... (36)

满 族

满族有二百四十三万人口（1957年），分布全国各地，而以辽宁省占的比例最大，为满族总人口的40%以上，其他则散居于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新疆等省区和北京、成都、西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分散杂居是满族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布特点。

满族中农业人口占80%，城市人口有四十八万，约占20%。由于近代东北地区和各大城市工业的发展，满族工人阶级队伍增长较快，由于清代的历史关系，满族知识分子人数也较多。

满族是十七世纪初期才形成的，但它的先世却从明代的女真上溯到三千年前的肃慎人。因而满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民族。

满族原有自己的语言——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满文是在十六世纪末采用蒙古字母创制的，用来记载政事，翻译汉籍，交流文化。入关以后满、汉长期相处，满族久已习用汉语、汉文，而汉语中也吸收了一些满语词汇。现在，除富裕县三家子、爱辉县大五家子等地方外已不使用满语、满文了。满汉族的共同点日益增多，民族差别越来越少。

(一)

“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居住在这里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族便是满族的先世，它们一脉相承，并和中原地区汉族自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肃慎是我国东北古老的居民。据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年，肃慎即派人向周王进献“楛矢石砮”。“楛矢”是长白山所产的楛木作的箭杆；“石砮”（箭头）是出自松花江的坚硬青石。肃慎人把楛矢石砮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最早地开辟了祖国东北大地。公元前六世纪东周时，肃慎地区和“燕、亳”同被列为周王的“北土”。春秋之时肃慎与中原地区往来不绝。

汉代，肃慎境内的一部——挹娄部兴起。挹娄人能种植“五谷”，善于养猪，会制作麻布和陶器。他们把采猎来的赤玉、貂皮和汉人交换铜、铁和布帛，并且把铜、铁使用到箭镞和铠甲方面。

在四世纪到七世纪时，肃慎、挹娄的后裔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现，人口繁衍扩大为几十个部，著名的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等七大部。各部与中原王朝间以“朝贡”和“敕封”的形式，发展和加强着联系。

在七世纪末，大祚荣以靺鞨人为主体的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713年大祚荣受唐政府册封为“渤海郡王”加“忽汗州都督”，这个“渤海国”通过经常到长安朝贡和世代请封号，把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传播到渤

海所辖的广大地区，因而渤海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冶铁和织紬很著名，宫室居住也采用中原建筑形制；唐朝的太学中渤海子弟很多，当时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的诗中写道：“疆界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足见唐代时长安与渤海地区经济文化各方面是“一家”。

位于渤海东北面即今混同江南北地方的黑水靺鞨，经济发展迟缓，它与唐代的关系也很密切。726年，唐在这里设立黑水州、黑水府，以黑水靺鞨人为都督、刺史。926年，辽灭渤海并迁其人西去，于是黑水靺鞨南徙到渤海原地区，改用女真的名称出现在历史上。十二世纪初，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号金国，并先后灭辽和北宋，成为与南宋并立的一代封建王朝。女真人大批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长期相处，被自然同化了。

元代在松花江下游迄黑龙江下游设置了五万户府、东征元帅府和后增设“吾者吉列迷万户府”直辖水达路。这里的女真较南迁的女真人发展迟缓，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满族先世建州女真即其中的一支。

明朝建立后，从十五世纪初，便在女真地区北起外兴安岭、东极于海至库页岛，西南包括吉、黑两省地方设立了三百多个卫、所，并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治所在黑龙江出海口内的特林地方）。明朝敕封女真各部首领为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职，让他们到北京“入贡”和贸易。明代把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份，海西女真原住在今松嫩平原，后南下定居在开原以北，他们以农业为主。使用奴隶耕作；建州女真是指建州卫的女真人，他们初时住在牡丹江下

游今依兰等处，后迁到今延边自治州一带，十五世纪中期又迁到今吉林通化专区和辽宁的新宾苏子河一带定居。他们也使用奴隶生产。奴隶的市场价格，幼童值一匹马，成人值十四匹马左右。由于汉族先进生产力的强大渗透和从辽沈地区输进铁器和农具，建州女真的经济发展最快；“野人”女真原住在黑龙江南北，生产发展缓慢。后来他们也逐渐迁到海西女真的原住地了。

在十六世纪中期以来，建州、海西女真各部之间为掠夺奴隶、财富和争夺地盘，互相征战兼并。历史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时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起来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事业。

努尔哈赤于1583年当“建州左卫指挥使”，他前期与明朝关系很密切，自以“保守天朝（指明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为职责。明朝先后提陞他为“都督签事”并加“龙虎将军”衔，树立了他在女真各部间的威望。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先将建州各部合并为一，随后又征服了海西女真，招抚了长白山东北与乌苏里江的东海各部，把“东自海，西到辽边，南达朝鲜鸭绿江”的女真人统一起来。满族的形成是以建州，海西女真人为主体的，吸收了部分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在十七世纪初期形成起来的。

1616年，努尔哈赤自登汗位，建号“大金”（史称“后金”），这个奴隶主地方政权的出现。是满族形成的一个标帜。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八旗制度也形成起来。1601年，努尔哈赤将所辖军民以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箭），建立黄、白、红、蓝四旗。到1615年时发展到四百个牛录，

又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八旗的各级首领既是军事统帅，又是政治统治者。所以八旗制度是满族军政合一的组织。它在前期起着加强军事统一，巩固各部联系的重要作用，为满族的形成增加了一条纽带。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大金”为“大清”，定本族名称为“满洲”。“满洲”是满族的族名而不是地区的名称。后来帝国主义者把我国东北地区叫作“满洲”，这是别有用心篡改。

满族在初期本民族的特点很显著，这首先表现在“国语骑射”方面。“国语”即满语，它是满族共同的语言。骑射为满族所擅长。儿童六七岁时，就以木制弓箭习射，稍长就骑马佩矢，驰骋山林。女子也骑射成风，英姿飒爽。满族的服装，男子多穿带马蹄袖的袍褂，腰束衣带。女子穿长衫（俗称“旗袍”）。著绣花鞋。男子顶上留辮，薙去周围头发。女子则盘头翘，喜戴耳环。早期因地不产棉，富人多穿麻布，穷人以狗，鹿皮为衣。迁入辽沈地区后，贵族、富人穿绸著缎，平民则穿布衣。到皇太极时，规定服饰等级，从此，在穿著上也反映了阶级的差别。

满族注重礼节。过去相见时，曲右膝，垂右手，行“请安”礼。亲故相见，行抱腰接面大礼。满族好歌舞。在喜庆宴会时，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舞时举一袖齐额，曳一袖于背，盘旋进退，其中一人歌唱，众人呼“空齐”声相和。他们也吸收了汉族和各族的艺术形式，在宫廷中舞乐备陈。满族民间原来比较简单的秧歌舞，也发展为演出角色繁多，歌舞交织，参以说白和锣鼓伴奏的复杂完美的歌舞。入关后，满、汉长期相处，风俗习惯相互浸润交融，已难以区分了。

(二)

满族从进入辽沈到统一全国后，与汉族长期杂居，在先进生产力的促进下，奴隶制迅速转变为封建农奴制和租佃制地主经济。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很显然，野蛮的奴隶制在辽沈和关内都是行不通的，满族统治者采取圈地方式，强暴地夺占关内外大量民田，实行农奴制生产。这些被圈占的土地，一部份按八旗兵丁每人分给六垧（三十亩），称为“旗地”；另外则被皇室和贵族所占有，叫作“皇庄”、“官庄”。皇庄和官庄的生产，由“庄头”驱使“庄丁”进行，庄丁的身份和地位都是世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都由庄园主供给，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人身也极不自由。所以庄丁就是农奴。旗地的生产关系比较复杂，一种是占田多至几百垧的旗人，他们拥有“壮丁”和“包衣”（奴隶），实行农奴制生产；另一种是八旗兵丁和未服役的“余丁”，他们自耕分得的有限土地，属于自耕农性质；还有旗丁因服役当差，把土地招佃而收取租息，是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形态。

由此可见，满族内部的阶级分野是很明显的，“壮丁”，“包衣”，八旗兵丁和绝大部分“余丁”是满族中被压迫和受奴役的被剥削阶级；而皇族，八旗贵族与官僚便构成了满族统治阶级。在鸦片战争前，满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主要以“壮丁”的逃亡和旗人逃旗为表现形式。同时也采取抗租、索饷、参加农民起义对满族统治者进行斗争。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各庄园的壮丁阶层不堪落后的农奴

制榨取，逃亡逐年增加，最多时一年达三万余人，这就迫使农奴制经济不能再继续下去，加以交错相邻的汉族先进经济的浸润溶化。所以到十八世纪中（乾隆时），旗地和官庄中都先后转化为租佃制地主经济，满、汉经济发展水平也日益趋于接近。

与此同时，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八旗制度，也转化为束缚满族人民发展的桎梏。它不许旗民自由迁徙，不许旗民从事工商，因而使城市中旗民无所职业，游手而仰赖“皇粮”。但人口滋长，饷银有定额，八旗的生计日益困难。于是不断发生索饷闹事和逃旗出籍为民，以求自谋出路。乾隆初年逃旗法的颁布和旗档中注有“逃”字的人大量出现，便是满族人民对腐朽的八旗制度作逃亡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的加剧，越来越冲破限制，从而推动了满族社会的发展。

十九世纪初，阶级斗争更尖锐，满族人民参加农民起义也越多。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便有北京旗人陈爽等成批人参加；川楚白莲教起义中，旗人曹伦等也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由于满、汉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推动了清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的发展上。清初由于大量圈地和推行农奴制，使辽沈地区与河北等省农业遭到破坏和倒退，但自康熙即位（1662——1722）以后，有力地打击了满族贵族的反动势力，在政治、经济方面作了一些必要的改革，圈地被迫废止，赋税劳役不能不有所减免。在兴修水利，治黄河、开垦荒地等方面，都有所进展。到十八世纪中（乾隆时），清朝的人口、耕地面积，农业和手工业都显著上升，资本主义因素也在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超过了明代的水平。

特别在东北地区的开发上，满族人民的贡献更为显著；辽宁在1661—1727年间，旗人耕垦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五倍；吉林驻防八旗开垦的土地，到乾隆时达三十六万余垧，黑龙江十七万余垧，以后陆续增加。这使得东北产粮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大批供应关内。其他如东北的名产柞蚕丝便出产在满族地区。人工培养人参和驯鹿业也有满族人民心血劳动的成果。

其次，在巩固我们多民族祖国的统一方面，满族也有过巨大的贡献。清初，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周边各少数民族由于满族的关系，加强了与祖国内部的联系。从康熙到乾隆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措施，使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得到重新巩固和加强。这个历史功绩，是满族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第三，在文化领域内，满族也有所前进和发展：康熙主持下编著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和《皇舆全览图》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十七世纪纳兰性德的《饮水词集》，攀登了清代词学的高峰；十八世纪曹雪芹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堪称世界文学的珍品；十八世纪初昭槤的《啸亭杂录》，是关于满族政治、社会、历史等的一部可贵著作。同时期，满族民间文艺家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和“八角鼓”是北京和东北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形式。这些文化上的丰富成果是满汉文化交流的结晶，也表现了满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富于创造精神。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汉

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为争取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 满族人民与满洲贵族两种不同的态度——满族人民与满洲贵族阶级地位对立，在近百年历史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根本不同。

鸦片战争中，清最高统治者始则虚骄轻敌，继而动摇，终至妥协投降，可耻地丧权辱国。而满族士兵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可贵的鲜血和生命。在浙江乍浦，满、汉爱国士兵以劣势武器，阻击了英国侵略军五次疯狂进攻，使敌人付出重大伤亡，他们也血染天尊庙，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镇江城，满、汉士兵千余人面对五倍的敌人和优势的炮火，浴血巷战，寸土不让。革命导师恩格斯赞扬道：“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遇到同样的抵抗，他们就不会得到南京”。

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清政权，削弱了八旗制度，为满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创造了条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汉统治集团腐败不堪，奉行投降政策，一贯避战求和，以至海陆军战无不败。辽东广大地区，敌骑深入。英勇的满族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奋起组成民团、乡勇，以刀斧锄镰为武器，抗击日寇。他们战术灵活，或乘夜包围敌人予以杀伤，或据山险予以阻击。特别是岫岩古洞峪的满、汉人民组成的一支三千余人的乡勇，抗击日军达月余，终使敌人不得逾越古洞峪以攻辽阳。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关内外满族人民更是普遍参加，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严重惩罚。满族士兵恩存便把敢于开枪挑衅的德国公使送见“上帝”。广大满、汉各族人民所显示出来的无比的反侵略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

国的梦想。证明中国人民永远是不可征服的。

在辛亥革命中，满族各阶级的态度很不相同。满洲贵族和官僚要求维护他们的统治，竭力抵制革命，作垂死挣扎，组织“宗社党”、“勤王军”与革命相抗衡。谋些王公贵族甚而企图勾通外国，潜谋“满洲独立”。但广大满族人民则是赞同和拥护革命的。满人鲍化南、何秀斋便与革命党人宁武等组织领导了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并为革命而牺牲；满族急进知识分子宝崑、田亚斌与同盟会员张榕（汉军旗人）在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他们虽然被清政府杀害了，但他们代表了满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正确方向。辛亥革命对满族人民来说，是件大好事，它推翻了压在满、汉人民身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冲毁了八旗制度的僵尸，对满族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2. 满族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在党领导下的解放斗争——满族和汉族工人阶级队伍是并肩成长起来的。在少数民族中出现最早，人数最多。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官办工业中，便产生了第一批满族产业工人；东北各地采煤、冶铁、金矿等企业改用机器生产时，产生了另一批产业工人；帝国主义在东北修筑的铁路和所办轻重工业中，又有大批满族工人劳动。他们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革命性最强，在党所领导的解放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1921年秋，满族工人王俊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七”大罢工时，王俊是长辛店铁路工会委员之一。此后，许多满族优秀儿女如关向应、李笛晨等同志陆续被吸收入党。关向应是辽宁金县人，早年当印刷工人，1925年入党，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在工作上“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生活上艰

苦朴素，永不变色，他是党的六大和七大的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党的领导下，满族工人运动迅速开展。在1923—1927年间，东北各厂矿罢工达一百八十余次，参加的满汉工人达二十余万。尤其是1926年大连福纺纱厂大罢工和1927年本溪煤矿大罢工，予日本资本家以沉重打击，获得胜利结果。1928年反对日本修筑“五路”（长大路、吉会路、延海路、吉五路、洮索路）斗争中，满汉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都广泛参加了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满族人民奋起参加义勇军、反日会等组织，仅在宁安县的世环镇就有70%的满族加入抗日会。此后许多满族工人、爱国志士加入抗日联军，如陈汉章、鲍巨魁等人成为优秀的干部，并为保卫祖国流血牺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的满族人民积极参加和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战争，河北遵化县马兰峪的满族1939年就有二十三名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平津地区的满族知识分子在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很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有许多满族的指战员，其中著名的领导干部如关向应，赵靖远等同志，为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公敌蒋介石从峨帽山上跑下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发动内战。在解放战争中满族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在后方的满族人民大力支援前线。有不少满族指战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满族人民喜庆新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道上，高歌猛进。

1. 政治上民族平等——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歧视、压迫满族，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满族享有了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欣喜地恢复了自己的满族成分。成了新中国的主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决定。散居全国各地满族，在各级政权机构中都有相适应的代表参加。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中，满族代表有九名；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中，有满族代表十二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中，有满族代表十五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满族代表十八人。以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适应的满族代表名额。对比解放前的无权状况，满族代表登上人民大会堂，心潮澎湃，写道：“大会堂里金光闪，我在主席身边站，鼓掌欢呼心里跳，热泪滚滚湿衣衫……党的关怀恩如山，浑身百倍力量添，坚决跟党闹革命，永做红色宣传员。”

在1955—1957年间，在满族居住较多的省区的农村，先后建立了民族乡。例如河北省建立了满族乡三十九个，各满族乡的代表和委员都以满族为主。公社化后，政社合一，满族仍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满族的干部也迅速成长壮大，他

们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 经济上繁荣发展——首先,在农业方面,满族农业人口占80%,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满族贫下中农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便是个生动的例子。以前,在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压榨下,这里的满族人口由三万多人锐降到一万余人,而且贫病交困,糊口艰难。解放后,粮食产量逐年上升,自1957年以来不仅自给有余而且每年卖大批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又在荒山造林二万多亩,植果树数千株,古长城下松柏桃梨交相辉映。水果产品收入1958年仅马兰关就达三万多元,约占总收入的20%。马兰峪人民抚今追昔唱道:“想从前,看如今,我们的光景天地分!”辽宁凤城后营子在合作化后,兴修渠道塘坝、平整土地,精耕施肥。又在公社化后添置各种新式农具,进行技术革新,农业生产力有大幅度提高。沈阳市郊高坎人民公社利用公共积累和国家贷款,逐年增添了拖拉机、汽车、排灌机、打谷、扬场、磨粉等各种机械,使农业机械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吉林榆树县光明公社小乡生产队,地处穷山僻壤,但这里的满、汉族社员立志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绘新图,他们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政治统帅生产。自1964年以来,连续九年粮食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1971年粮食亩产平均达一千多斤,使东北高寒地,种出江南丰收粮。满、汉社员家家有存款,户户有储粮。山乡巨变,成为吉林省的大寨之花。

在工业战线上,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建设重要基地,也是满族人口最多地区。东北满族工人众多,主要分布在钢铁、机械、煤炭、纺织、交通运输和商业等部门。据沈阳、抚顺、

哈尔滨、吉林、北京等七十个市二十五个现代化工矿企业的统计，1957年满族职工人数比1952年增加了53%。其中沈阳重型机械厂、抚顺西露天煤矿和本溪钢铁公司第二炼铁厂的不满族职工增加80%。与刚解放初1949年相比，1958年辽宁省的不满族工人增加了六倍。

广大的满族职工在党的教育下，他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革命而钻研技术，出现了不少技术革新能手，有不少革新和创造；据沈阳、抚顺、本溪、鞍山、旅大等地一些厂矿的调查，满族工人和各族工人一起，曾创造了高炉利用系数全国记录，煤炭剥离量日产世界最高记录，机车运输全国记录以及其他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事迹。如本溪钢铁公司机电厂的一位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技术员，他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帮助下，十多年中创造和改革工具一百九十多项，卓著成效。吉林油脂厂的满、汉各族工人，遵循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艰苦创业，勤俭办厂，“三口大锅闹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谬论，攻破了技术尖端，创制成功了质量超越国际水平的皂基高温润滑脂。既满足了工业上的急需，又节省了外汇，吉林油脂厂成为满、汉人民“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

满族城市手工业工人很多，解放后经政府安排就业，并实现了合作化，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有很大提高。

3.教育文化上的新篇章——随着工农业的大发展，满族在教育文化上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这首先表现在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上。自大跃进以来，东北三省满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5%以上。据辽宁五十五所专科学校1958年统计就有